

华族在印尼群岛大都市 最早兴建的五大中华医院 (2)

开始，多数贫穷华人子弟没有得到教育。所以在1753年9月3日Jacob Mossel总督发出新的条规。就开办了由巴达维亚中华族群经营，供贫穷华人子弟就读的学校。该学校设在中华医院的北边。VOC也同意有两三个欧洲人的孩子在该学校学华语。政府认为学华语不只对VOC有利益，但也对更常讲马来语的殖民地华族有益。

在一个条规里也说，在中华医院的每位病人，除了三餐，每个月还要给他们小食和啤酒，包括衣服。但如果有华族病人逝世，他的家人必须6块钱埋葬费。

原来除了护理中华和非基督徒病人，该医院也成为神经病者收容所。其他市民，如被称为自有人的，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就收容在贫民屋。本来Schepenen机关是选择市政厅里的牢房来作为神经病者的收容所。

久而久之，中华医院成为神经病者的收容所。有问题的奴隶也被放在中华医院。他的主人必须每月付两块钱给医院的监管人作为护理费用。因此，医院的建筑就被扩大，尤其是



RS PGI Cikini 1895

收容神经病者的地方，多加两旁建筑。

F. de Haan记载说，中华医院的个性很混杂，没有中华人和本地人的隔离。与政府在巴达维亚的人口和住宅方面的隔离政策完全不同，隔离政策规定每一族人要住在同族的住宅区而不可定居在别族的住宅区。

医院的状况越来越恶劣。尤其是1740年10月发生的中华人被大屠杀（即红溪河惨案）时，有大约500个中华病人被拉出医院并在广场被屠杀。以后就没有华人成为中华医院的病人了。自1800年代开始该医院反而成为乞丐，流浪汉，和锁链囚犯的收容所。几十年后医院的状况更严重，更肮脏，而且不可有人住。在第20世纪初期，中

华医院已经没有其作用。在1912年1818医院被关闭，但却为成立原住民神经病院开路。

还有中华人对巴达维亚的卫生服务的其他贡献。在VOC的员工体制里，有成为中国医生职位名称。也承认中国医术的作用。在1635年有一位称为Isaac先生的中华基督徒担任VOC的卫生人员。Joan van Hoorn总督有一位中医师，名叫朱必查，在Joan van Hoorn任期完后带他去荷兰。朱必查以前是制酒的人。Joan van Hoorn死后不久他再回来巴达维亚。

F. de Haan也记载说，在30年期间，=，在健康的事上，Mattheus de Haan总督一家人由一位中华雷德兰的妻子服务，但没

有说出她的名字。

无法追查后来成为处理精神病者的中华医院与现在的Grogol精神病院没有关系。但根据Grogol精神病院的官方网站说，该医院是1876年建成的。该医院后来在1973年改名称为雅加达精神病院，在1993年改名称为雅加达中央精神病院，然后在2003年改名称为Soeharto Heerdjan医生精神病院。该医院的地点是在雅加达Grogol区Latumaten街。

印华早期兴建的中华医院

20世纪柯全寿(Kwa Tjoan Sioe)医生对殖民政府没有关心当地人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卫生深感担忧。从荷兰回来后，柯医生在Chaulan巷(Kemakmuran街，现在KH Hasyim Ashari街)开私人诊所。后来继续在Mangga Besar街40号开诊所，该诊所成为养生院的先锋。

1924年12月24日几位中华名人组织养生院基金会。他们是林添裕，陈文星，洪渊源，李兴濂，邓永安和林金英医生。养生院的意思是照顾卫生和保养生命，是陈文星所选，他是其中

一位创立人，也是巴达维亚中华公馆的秘书。

基金会在1925年就开始筹款，但所筹到的款还不多。1930年得到10万盾的基金，而需要的基金是30万盾。1930年代的萧条也影响到筹款的努力。

在1931年才有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商人胡文虎捐38,000盾来建一座贵宾病房。然后在1934年来自文迪兰的丘客贤捐18,000盾建X光和手术病房。1937年来自Tegal的林源基捐22,000盾和来自茂物的唐俊乐捐10,000盾建医院楼房。

在柯全寿(Kwa Tjoan Sioe)医生的领导下，养生院医院变得很出名。尤其是医院参与救灾民的工作。当1939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养生院组织红十字会并派救护车和医生到中国大陆赈灾。

在日侵时代，养生医院变成Gunseikanbu Tokubetsu Kanrei Yo Sei Shinkai。柯全寿医生和中华精英被关进日本集中营。他们从雅加达Bukit Duri坚牢迁到Serang，最后迁到芝玛墟直到盟军释放他们。在日本集中营期间，柯医生大